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霧峰，長期素有「菇的故鄉」之稱。菇類產業發展的歷史，可往前追溯至民國 42 年（1953）開始，政府分期推動四年經濟建設計畫，並訂定「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經濟發展策略。第一階段是「進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爲頭二期四年經建計畫（1953-1960 年），此時因配合美援物資，擴大農工生產，將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出口，藉此換取輕工業資本設備進口，提升民生工業之發展。因此食品罐頭產業乃在政府採取整頓並推動一系列改革措施之鞭策下逐漸脫穎而出（李坤木，1978：225），此時鳳梨罐頭爲罐頭食品主力外銷產品；第二階段「出口擴張」(export promotion)，即後三期四年經建計畫（1961-1972 年）的成長策略，要求農業須提供外銷製造業充分糧食資源和充分農村外流勞力（廖正宏、黃俊傑、蕭新煌，1986：55-56），並以初級工業產品銷往東南亞地區，而勞力密集產品銷往進步國家市場[1]。因此早期農業政策乃是農業透過「提供低廉糧食與原料、提供資本、賺取外匯、供應工業產品的市場與勞力」等途徑，促進工業部門及整體經濟之發展。洋菇罐頭之外銷自第三期四年經建計畫即列入食品加工發展項目[2]，民國 51 年（1962）開始實施「計畫產銷」，此爲政府主導的農工合作經濟發展政策。

洋菇栽培是農家副業，其生產期正值冬季農閒時期，可利用農家剩餘勞動力；其次，洋菇栽培佔用耕地有限，係在室內培養，其設備亦甚簡單；再者，洋菇乃是加工外銷產品，其生產期亦正是鳳梨食品加工廠空閒期，故可充分利用其加工設備，製罐外銷（林維義，1967：169）。所以在民國五〇、六〇年代政府主導推展下的洋菇罐頭產業，即是善加運用數以萬計的洋菇小農投入生產行列，因此洋菇罐頭以其低成本、低價格逐漸霸佔國際市場[3]，同時成爲台灣四大出口食品罐頭之一（圖 1-1-1），主要銷售市場以西德與美國爲出口大宗。洋菇罐頭是台

---

[1] 經濟部編印，《中華民國第 4 期台灣經濟建設 4 年計畫》，頁 408。
[2] 經濟部編印，《中華民國第 3 期台灣經濟建設 4 年計畫》，頁 126。
[3] 依據胡開仁（1963），〈台灣之洋菇〉一文中記載，當時民國 52 年（1963），日本洋菇每箱在國際市場價格為美金 17 元，法國貨每箱為美金 20 元，台灣洋菇每箱為美金 13.5 元，佔其優勢之高。

灣當時賺取外匯的重要出口農產品，台灣並因此獲得「洋菇王國」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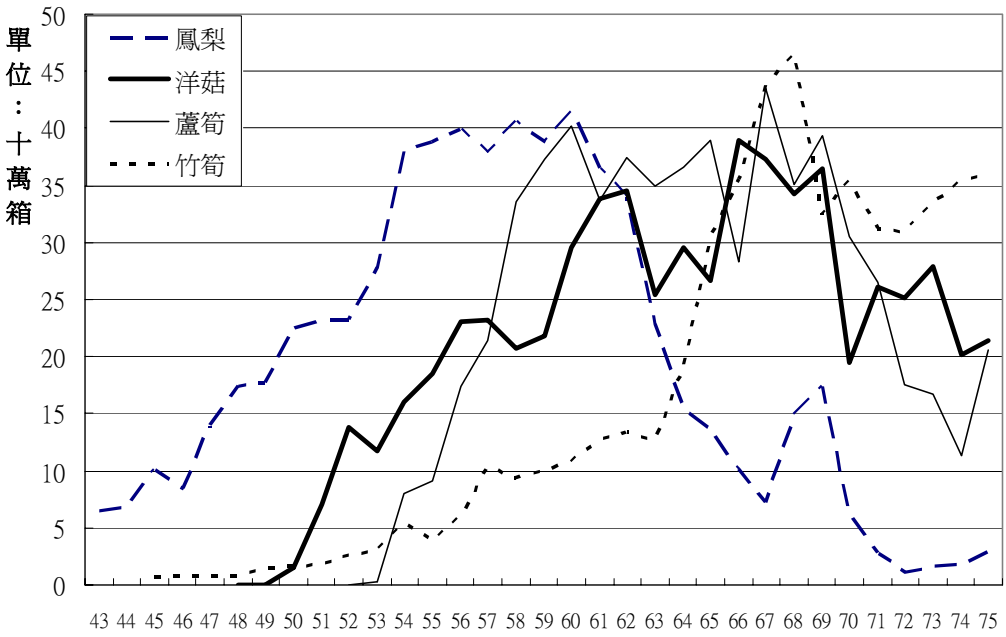

圖 1-1-1 台灣早期四大食品罐頭外銷箱數比較圖

資料來源：台灣區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編（1965-1986），《罐頭出口統計》。

洋菇真正進入商業性的栽培，始於民國 45 年（1956）由台中縣霧峰鄉的菌種場推銷菌種，負責指導農民栽培及管理方法，進而擴充至鄰近鄉鎮；後因內銷市場逐漸飽和與外銷罐頭市場的展開，使得栽培面積不斷激增（林維義，1967：178）。至民國 54 年（1965）全台灣洋菇菌種場數量總共有 62 家，其中台中縣佔 30 家爲最多，霧峰鄉又以 11 家菌種場[4]爲領先。在栽種洋菇之盛況年代裡，霧峰一幢幢分散座落在鄉村間的菇寮，爲鄉人至今回憶深刻的農業景觀。有「菇的故鄉」之稱的霧峰，其淵源即從洋菇的小農栽種開始。

然而洋菇罐頭外銷的好景卻隨著國際市場的競爭、工資及材料成本上揚而逐漸萎縮，經濟部於民國 79 年 9 月 7 日公告廢止「外銷洋菇、蘆筍及竹筍產品計劃產銷辦法」，負責洋菇罐頭出口的「中國台灣洋菇罐頭聯合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79 年 12 月 31 日解散，結束台灣長達 27 年的洋菇罐頭產銷計畫任務（陳敏媛，2007：115）。至民國 82 年（1993）已沒有洋菇罐頭外銷，菇類產品改爲內銷爲主的生鮮洋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29）。

雖然洋菇栽培盛況不再，部分菇農不忍將已投入資金建設的菇寮拆除，輔

[4] 依據林景明（1966）調查的農林廳資料（1965），當時台中縣霧峰鄉合格菌種場有：豐利菌場、張養菌園、養和養菌園、松彥養菌園、中台菇類菌種培養園、許養菌場、富源養菌場、林養菌場、裕豐養菌場、協興養菌場、協興菌種場、坑口養蜂養菌場等 11 家。

以，霧峰當地些許菌種場也開始培養其他菇蕈類菌種，同時民國七〇年代台灣研發太空包[5]栽培並試種成功，利用現有的菇寮轉種如木耳、鮑魚菇、香菇等。然而，銷售通路不如早期政府收購的穩定，加上台灣工業的興起與發展，霧峰勞動人口多移至鄰近的台中市、大里、烏日一帶尋求工業或服務業的工作。農村地區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年長農務者多不願於二期水稻收割後再投入其他菇類副業的生產，而目前霧峰積極投入生產菇類者，年齡分佈多介於 40-60 歲之間，同時也逐漸採用專業化經營方式，據霧峰農會統計資料顯示，菇類產銷班計有五班，組織成員共 64 位[6]。霧峰地方菇類產業調適的過程，可說與台灣經濟脈絡與農業變遷息息相關。

霧峰菇類調適生產種類繁多[7]，其中又以「金針菇」一項傲視全球，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生產場地。原本只在日本寒冷季節生產的金針菇，自菌種引進台灣後，逐步擴大爲機械自動化及密閉空調設備的農場，成爲四季無限制的生產，可見其前途方興未艾。然而有別於過去種植洋菇時期，以小菇農爲生產單位，所需材料與人力，多是農村的副產品與剩餘勞動力，現在霧峰從事生產金針菇的菇農雖然只有 5 戶[8]，但生產結構已由過去兼業種菇，轉變爲大規模且專業化的精緻農業，成爲大農經營的規模型態。近年來霧峰金針菇的產量就高達全台灣總生產量 88%以上（表 1-1-1），此外，全台金針菇專業化生產農場約有 23 戶，分布在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及苗栗縣等中部四個縣市。其中霧峰鄉就有 5 戶生產，佔四分之一弱，不遑多讓爲金針菇之生產重鎮。

表 1-1-1 民國 96 年（2007）各縣市金針菇生產量比較表

生產縣市	生產鄉鎮鄉鎮市	栽培量（千瓶）	單位產量（公斤）	總生產量（公斤）	佔全台灣產量比例（%）
苗栗縣	苑裡鎮	5,000	85	425,000	2.50
台中縣	霧峰鄉	59,200	255	15,096,000	88.69
	石岡鄉	1,350	240	324,000	1.90
	大里市	1,500	200	300,000	1.76
	外埔鄉	80	200	16,000	0.09
	新社鄉	120	230	27,600	0.16

[5] 陳啟楨（2004）指出太空包栽培法(Bag log Cultivation)是將適合栽培之木屑，加上其它培養配料如米糠、玉米粒及豆等調合，以半自動化方式充填到塑膠袋中，作為菇類栽培之用。

[6] 霧峰鄉以稻米及龍眼產銷班為最多，各有 17 班，其中稻米產銷班班員為 425 人，龍眼產銷班則為 280 人。（資料來源：霧峰鄉農會 http://www.wffa.com.tw/news/news_index.asp）

[7] 目前霧峰菇類生產計有金針菇、木耳、杏鮑菇、秀珍菇、鮑魚菇、鴻喜菇、洋菇與草菇等。

[8] 以戴養菌場規模最大，其餘有得旺農場、俊美菌園、農林養菌場、禾堤農場等 5 家。

南投縣	草屯鎮	2,500	200	500,000	2.94
	竹山鎮	300	185	55,500	0.33
彰化縣	埔鹽鄉	1,385	200	277,000	1.63
全台灣		71,435	238	17,021,100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農情報告資源網 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瀏覽日期：97/05/05）。

霧峰產菇歷史源遠流長，在菇類生產地中獨佔鰲頭，霧峰鄉農會更於民國 87 年（1998）在其辦公大樓六樓，設立全台唯一的菇類主題博物館，對世界菇類作完整介紹。

由上述可知，霧峰與台灣菇業發展之間，存有密不可分之關聯性。因此本研究欲以有「菇的故鄉」之稱的霧峰鄉作爲研究區，並試圖從已觀察的現象面提出研究問題：霧峰由過去每十戶中即有八戶投入洋菇生產的小農農業地景，如何轉變爲至今僅有少數農戶得以經營金針菇栽種的大農規模經濟型態？

研究者欲從地方再發展與產業調適之角度，深入探討霧峰洋菇如何轉型至金針菇的栽植。透過比較兩種不同時空下具代表性的菇類作物，所體現出產銷型態與農家投入的差異性，進而說明著社會關係與空間型態的改變與再連結。藉此闡明不同於，傳統經濟地理主要研究經濟活動的區位及空間分布之單一論述。新經濟地理嫁接了文化、經濟、社會、消費與生產、人—自然—物之間的關係，這是由經濟活動所延伸的眾多社會關係及產生的空間性。Yeung(2003：37)指出新經濟地理關心的議題包含了經濟活動中社會鑲嵌性(social embeddedness)、社會行動者主體性轉變，及探究在形塑經濟行爲中物質的角色與之中隱含的脈絡。在討論地方發展議題時，新經濟地理給予了重新詮釋地理景觀的一個利器與更多理解的面向。

農業經濟研究取向的發展也面臨新的轉向。Bowler 和 Ibery(1987：327-334)認爲農業地理已經由傳統型態（生產、土地、勞力、資本、農場規模、農家收入）轉而被糧食供應系統(food supply system)給強化了，納入非農業部門（如運銷、加工、服務部門）才能使農業活動順利運作，因此農業地理的重新定位，需著重在農業、農村、都市經濟及社會之間關係的連結。Jarosz(2000：279-283)論述在處理特定地區的農糧網絡時，應探究於生產者、製造商、供應商、批發商等內部細緻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因爲這對於網絡的效力及活化是重要的。這意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影響著產業活動的進行。

因此在討論霧峰洋菇到金針菇之間的轉變時，應擴展討論農業部門與非農業

部門的產銷網絡，尤其在非農業部門方面，更著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影響產業發展，而在新經濟地理中所強調的社會鑲嵌性，就是探討社會網絡中關係的運作。故本研究在瞭解地方農作轉種時的調適過程，以菇類產業爲中介分析菇農如何在不同的產業經營模式中，進而影響到所形塑社會網絡關係，並呈現出農業景觀的差異性。因此以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觀點切入，在時間軸下理解從小農到大農社會空間的轉變，如何有意義地呈現出一個「菇的故鄉」之面貌。

以下繼續就研究問題與初步田野調查結果作細部發問：

1、現今霧峰菇類生產農家背景多可回溯自早期洋菇栽種或做菌種的經驗，因此關切過去本身歷史脈絡中洋菇發展情形實屬重要。而霧峰洋菇的興起源於整個台灣外銷洋菇罐頭事業的發展。洋菇罐頭產銷計畫下的生產運作系統是由政府單位（經濟部、農林廳、外貿會、農會）、菇農（洋菇栽種農家、菌種場）及罐頭食品加工廠與聯合出口公司所組成，目的是爲台灣賺取大量外匯。在國家強力介入洋菇生產下的霧峰菇農，於產銷結構中地方所形成的網絡關係爲何？伴隨著產業結構變遷與調適過程，成功轉型栽培金針菇，目前僅憑霧峰 5 家農戶生產，然產量竟能佔全台近九成之高。新的生產方式與產銷制度，代表著菇農在新型態產業活動中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社會空間是建立在關係網絡上，此說明了從洋菇轉變到金針菇所呈現出社會空間的差異性，產銷網絡的變化爲解釋地方調適現象的關鍵性因素。

2、再者，鑲嵌在洋菇與金針菇菇農產銷網絡中的社會資本是如何產生的？如何積累與運作？同時探討菇農內部社會空間中，關係連結強度與社會資本累積厚度：農作轉型說明網絡與合作關係的再形成，並在地方中長期整合集體行爲，組織內共同認定的規範使之成爲穩定的市場秩序，例如由金針菇同業組織而成的「金針菇生產業者聯誼會」，爲避免菇販亂喊價錢的情形出現，在組織成員的共識下，會不定期召集會員開會，制訂參考的批發價錢，而實際運作情形與恪守情況又是如何？此外，行動者之間的動態關係則維繫著網絡的運作，這種互動關係可進一步討論網絡中信任關係等社會資本，如何視爲一種產銷機制上的擔保，如過去菇販若要收菇批發販賣，需押房地契以作爲日後會按時付款的保障承諾，而現在各農場與菇販之間的合作，十天爲一期結算金額的約定是長久所建立的信任關係。不可忽視的是，社會資本的累積性是否均勻，蘊含了個人所處位置的不同，

聯繫強弱造成運用及取得資本的差異性，因此社會資本能闡釋社會空間發展的意義與地方調適之過程。

透過上述問題發問，以產銷網絡理解洋菇到金針菇地方調適過程，並以社會資本概念梳理出脈絡發展下的社會關係，有助於理解霧峰洋菇到金針菇社會空間轉變的區域特性。

二、研究目的

在本研究論述中，空間分析尺度將先拉大討論台灣菇類產業的發展，續至中部菇類聚集性產業區域的形塑，如新社、埔里等地生產其他菇類的聚集效應，都促進中部菇類生產空間的延續與集中化，在此環境背景下瞭解如何強化霧峰菇類產業的聚集。再細緻化處理霧峰菇農從洋菇生產到金針菇栽培，產銷網絡及浮現出大農小農空間的差異性；同時以社會資本指標分析內部社會網絡的動態關係，進而詮釋地方產業本身的調適過程，最終造成集中專業化生產的農業景觀。本文企圖理出，置於經濟結構下的霧峰菇類發展，在轉型與調整其農業棲位過程中，於地方因素與社會條件下，所體現出兩種不同時空作物的栽種產銷過程與社會空間，而其中的轉型過程並非是一個斷裂過程。

據此，本文欲解決「霧峰洋菇到金針菇的發展，如何由小農栽種型態轉為金針菇農企業化的經營模式？」，擬以具體研究問題為：「霧峰洋菇到金針菇的地方調適」，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台灣菇類產業發展及中部菇類聚集之背景環境。

（二）探究霧峰洋菇到金針菇產銷網絡的地方調適與小農大農空間的差異性。

（三）分析霧峰洋菇到金針菇的社會資本運作與社會空間的形成。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在文獻回顧的部分，首先探討前人關於霧峰發展歷程的相關研究，以瞭解前人是採取何種觀點來探究霧峰各面向的發展。

其次，回顧前人關於台灣菇類產業發展的研究，探討其解釋歷程的觀點之所長與不足之處。

最後，本文打算透過地方經濟活動中的社會資本議題，探討國內外學者如何應用社會資本的觀點於經濟地理範疇上，以明瞭先前研究是如何看待並解釋社會資本在網絡內部發揮功效，藉以帶動地方農業發展。

一、霧峰地方發展相關之研究

霧峰，爲農業生產的精華區，各類生機暢茂的農作物都曾扮演支撐鄉民經濟的重要角色。

黃繁光（2007）以**歷史**角度出發，指出霧峰農墾開拓與水圳的開發營運相輔相成。本地區屬於開闊型的平原地形，清治時期在地又有財力雄厚的墾號或大地主，如吳榮伯墾號、霧峰林家等主持其事，因此適合發展大型水利設施，泛稱作「阿罩霧圳」，灌溉面積約佔全鄉水旱田總面積的 80%。本文即藉由水利與平原地帶農業開發、農作生產、物產變化及經濟價值之間的發展關係，理解霧峰開發史上的若干演變實況。

霧峰林家在整個區域發展歷程中佔了重要的一塊。黃富三（1987、1992）是歷史學界中深度研究霧峰林家拓墾史的箇中翹楚。在一系列關於霧峰林家家族史的著作中，著重於**歷史**過程的描述，論及林家的崛起乃從拓荒的農家小戶，到成爲集政、軍、農、商於一身的顯赫家族。霧峰林家，成爲早期引領霧峰社會經濟與教育文化發展的主要勢力，同時反映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的某些特點，也是台灣歷史上血緣家族發展的一個典型代表。

隨著台灣逐步邁向工業化，毗鄰的大里市及太平地區陸續設立工業區，其所提供的就業機會與薪資均高於霧峰鄉。固然霧峰爲台中都會區的衛星市鎮之一，但產業結構仍以農業爲主，鄉內人口外移情形多。何淑鈴（2006）即以**人口和產業結構之變遷**觀點析論霧峰鄉戰後受到外部環境影響，進一步釐清人口減少與分布不均對於維持社會正常運作的困難，及產業受限於二、三級產業的不發達，與一級產業勞動力人口老化，促使鄉民多不在本地工作，甚至移往他地謀生。

民國 88 年（1999）九二一地震更重創霧峰鄉，導致鄉內人口大量外流，從原來約 9 萬人降至約 3 萬人左右。林雪美等（2000）在〈霧峰鄉九二一地震災情與其空間分布〉一文中，採**災害地理**的觀點，分析出車籠埔斷層線附近密布的受災房屋爲主要霧峰鄉聚落發展地區，房屋災情與「交通、聚落發展密集度、山坡地開發程度」等因素有密切關係。

地震的陰影在災後重建及時間軌跡下逐漸淡化，而隨著原建的中投公路及中二高重大交通建設逐一完成，爲霧峰帶來對外交通便利與商機復甦的正面影響。張淑君等（2005）採用**重大建設影響區域發展**的基礎概念，以霧峰農村社區爲個案探究交通建設帶來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交通建設雖爲當地帶來適時且便利的生活與生產環境，遺憾的是，居民卻忽視了環境保護與生活品質的重要性。

綜論之，關於霧峰發展的研究文獻，除了清治時期的霧峰林家貼近與地方拓墾的歷史論述外，多就一個農業鄉的樣貌，討論水利開發、農業發展、人口產業變遷現象、災後重建與農村發展現況。站在霧峰發展過程輪廓的基礎上，本研究欲細膩探究霧峰的「農業」圖像是如何形塑而成？或許可藉由霧峰地方重要菇類產業發展，討論人與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安置在空間的角度分析，來考察此一農業區域特性的形成原因。

二、台灣菇類產業發展相關之研究

陳秋仁（1983）論及**產銷過程與產業發展潛力**的關係。從經濟價值、菇農收益、運銷制度與方法、市場銷售面向等，分析段木香菇與太空包香菇產業，提出改善菌種培育品質、造林以取得生長媒材、加強運銷效率及穩定價格等建議，有助於香菇產業發展與延續，同時可改善貧困山胞生活。

張峻嘉（1987）以**生態系統**概念來探討五峰鄉桃山村生計活動的變遷。當外部環境因素投入此系統而產生衝擊時，原爲自給自足式的游耕狩獵活動就逐漸轉爲市場指向的農林活動。而村民生計活動之一的香菇經濟林產物，從受自然環境限制的採集活動，到菌種引進轉爲栽培活動。生產工具及經濟活動方式的改變，影響了勞力組成與工作時序。本文指出當市場經濟主宰其生存方式時，對於原住民生活與社會所產生的問題與衝擊。

早期香菇爲野生採集，產量少且仰賴進口，爲一經濟價值甚高的林產物。後

逐漸轉爲人工栽培方式，產量增多，也成爲大眾可食的菌菇。然而，所有菇類中貢獻於台灣貿易外匯最大的，屬洋菇罐頭的生產與銷售莫屬。

林維義（1967）一文研究背景爲洋菇罐頭盛銷時期。以**農家收益**分析概念，指出台灣洋菇生產極待解決問題：小農生產雖成本低，但單位面積產量及品質卻無法提升；此外，菇農淨收益部分因扣除家庭勞力成本才有利潤可言，菇農實質收益不高。在洋菇銷售方面，罐頭外銷配額及固定原料區收購的不彈性化制度，造成政府、罐頭工廠與菇農間的相互衝突。

陳敏媛（2007）透過**歷史**資料的整理，完整討論洋菇罐頭從民國 50 年（1961）至 79 年（1990）的發展。自民國 50 年（1961）被外貿會納入計劃產銷，從此在官方嚴格管控下發展洋菇事業。揭示此制度卻使菇農無法累積財富；罐頭工廠則安於現狀，無心在技術、管理、貿易行銷方面提升以創造競爭優勢，終使農工合作漸趨疲態。此文有助於研究者日後就國家主導的計劃產銷結構面向，分析霧峰菇農在外部環境與政策支配下，如何影響種植意願及與社會變遷對話。

台灣菇類研究多著重在生物科技分析，由上述文獻回顧可得知，以人文角度探究付之闕如。對於台灣菇類整體產業發展的探討，以香菇及洋菇爲主，係因最早栽種與發展，而現今台灣菇類多樣化的產品市場，食用及藥用保健菇的消費量也提升許多。此外，從香菇、洋菇到今日雜菇的生產過程，缺乏台灣菇類產業變遷完整的探究。所以基於前人研究基礎與不足之處，本研究以地方尺度來探討霧峰洋菇到金針菇產業的轉變，藉此能回應菇類發展過程，並從內部菇農經營型態與產銷網絡關係，析論菇類發展如何形塑地方互動及區域特性。

三、社會資本相關之研究

（一）國外相關研究

Murdoch(2000)以「網絡」來討論鄉村地區的發展。指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社會—技術網絡中重新被結構，並導致社會空間特性的改變。Murdoch 結合兩種分析面向來研究英國鄉村發展不均衡的型態：1、垂直網絡：透過農糧系統中的商品鍊(commodity chain)及行動者網絡(ANT)闡明關係上的連結與空間的延伸；2、水平網絡：整合了經濟發展因素中外生性(exogenous)與內生性(endogenous)發展策略的二元對立，鄉村發展中一種新的網絡詮釋由創新與學習所建構，而合

作與信任的過程能促進關係的緊密連結，並經由下列三點存在：（1）鄉村網絡與當地自然環境結合；（2）新的學習網絡是建立在既有的農業網絡基礎上，鑲嵌在地方文化與社會結構中；（3）鄉村地區的網絡關係可以延伸橫跨至更遠的距離之外，因此建立網絡與保持互動關係是重要的。

Flφysand 和 Sjφholt (2007)以地方鑲嵌性(embeddedness)概念檢視能動者與鄉村發展之間的關係，說明挪威西部 Stryn 地方產業由生計農業轉爲製造業、觀光業爲主的產業再結構化的過程。分爲兩個層面探討：1、地理鑲嵌性(geographical embeddedness)：時空壓縮與地理鄰近性所形成地方產業活絡的氛圍，顯現在產業群聚所形成的學習經濟網絡中，創新與競爭是面對全球化最佳的能力；文化鑲嵌性(cultural embeddedness)：爲黏著於關係網絡中的行動者，彼此分享知識、建立信任、發展默認的規範及互爲主體性的意義，產業環境中動態的關係反映出地方經濟的再結構化。研究結果同時發現地方外部相關產業，也鑲嵌在社會組織與鄉村發展脈絡中。

Jarosz(2000)理解區域農糧系統中連結行動者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關係。以美國西北部的 Puget Sound 地方中有機農業及在地永續生產的農業實踐，來檢驗農民、消費者、非營利單位、學校等形成網絡中的關係，同時指出過去在農業社會中遭忽視的女性，在農糧網絡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Lyon (2000)探討迦納 Brong Ahafo 地區關於農業生產、市場及金融系統的蕃茄經濟活動。藉由網絡、規範及信任等社會資本的實踐，分析當地貧困的農夫如何與資材商、批發商建立起貸款的非正式制度，這之中的金融交易常需透過地方熟識的人牽連起關係。農夫得以賒欠金錢，但需保證更好品質的蕃茄讓債權人批發商有穩定的貨源；當市場供過於求時，批發商也有義務保證收購，雙方因爲信任的運作能有更多的客戶來貸款。此外，網絡中不平等的關係，代表可控制資源的強弱，例如當農民藉由教會或自行組成團體時，對於資材商或批發商有更強的議價權力。

Kilpatrick 和 Lan(2003)析論澳洲 Tasmania 島社區農企業，在面對全球經濟壓力，在管理技術、金融、自然資源及市場上所作出調適。農民在心態、價值觀、態度上的調整與農業實踐上的轉變，主要來自社區間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連帶關係的建立意味著知識、資源的分享與接受在彼此間的傳達更爲容易，網絡也作爲一種微觀經濟社會層面社會資本，以促進學習而轉以改變農業經營。因此，農

業是一種社會活動。

（二）國內相關研究

蕭崑杉、蔡必焜（2003）談論永續農業知識中社會資本與社會學習的關係。強調認證功能的 MOA（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以規範爲依據所呈現的信任關係，並未明顯有內化目標的共同行動團體；而著重產銷功能的瑠公基金會，依據市場需求，而形成信任關係或互惠價值的交換，較能達到結合參與和社會學習的互作用。此篇文章重點在於，有機農業依認證和產銷過程的兩類作業，而社會資本在穩定性、累積性和共同行動促進力方面的表現是有所差別的。

陳恆鈞、張國偉（2006）則以雲林縣蔬菜產銷班爲例，研究產銷班與農政單位之間相互協力的程度是否與班組織績效具有相關性。此篇研究乃利用多元歸納分析，針對組織力各項成分以及組織績效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研究發現承諾、信任、公平、能力、夥伴關係及組織運作方式對於產銷班運作有正面影響。然而研究者採用問卷調查方式及計量方法，因此無法進一步瞭解指標因素如何影響組織運作。

張淑媚（2007）以彰化縣有機蔬菜產業爲研究個案，利用「農業糧食供應鍊」與「社會資本」的概念，呈現一般農業與有機農業的社會空間差異。研究結果發現有機農民所須聯繫的社會空間範圍皆大於一般農民。

梁炳琨、張長義（2005）在〈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的文化經濟與社會資本—以山美社區爲例〉一文中，闡釋部落從資源基礎的地方經濟，轉爲以符號和想像爲主的文化經濟地方，應考慮交織於特定地方的複雜社會資本。當社會資本轉化爲地表的具體行動可由村民過去長於廝的歷史情感，幼時溪流的經驗，轉換爲當今集體參與護溪的認同行爲當中，進而成爲地方再發展的動力與策略。

另一個「地方再轉型發展」的例子是，九二一災後重建的桃米生態村。江大樹、張力亞（2008）論述社區營造的推動，其本質乃是以「網絡治理」的型態，而「信任」是其中核心價值。歸納桃米社區轉型成功經驗，發現信任的建構是架構在「被信任者的特質」與「組織互動模式上」，而認同型信任的共識凝聚與制度型信任的公正、公開及參與或是組織互動基礎，唯有透過溝通與協調的技巧才有可能邁向永續發展的社區經營。

上述指陳的社會資本與地方發展文獻討論中，可發現關於過程性以及關係性

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經濟活動是歷經多種社會關係、社會資本不斷的積累所構成。藉由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提供了本研究基礎性的瞭解與概念的反省：

1、社會資本指標及測度問題

社會資本強調行動者嵌入性特徵，認爲所有行動者都與環境中的其他人存在相互聯繫，這之中衍生了許多深入細緻的概念，例如強弱不等的「信任」關係建立而成的網絡。然而「信任」如何透過經驗性的研究來確立呢？具體在本研究呈現的方式是否可以從「農產品品質」、「熟識程度」、「減少交易成本」等著手討論？

2、社會資本強弱及其影響性

在上述幾篇學者研究中，皆忽略社會資本的累積性是否均衡，蘊含了個人所處位置的不同，聯繫強弱造成運用及取得資本的差異性。這也是本研究欲細緻處理個體在網絡內部累積與掌握資源的差異，造成日後金針菇 5 戶發展呈現不均質的現況。

3、社會資本與空間尺度對話

信任與規範不必然產生於社會網絡，也可由法律或產權等方式制度產生，因此社會資本與地方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必須謹慎處理。從山美社區此一文中，可順勢發現除了社會資本對於建立地方感的重要性之外，全球文化經驗興起、與國家社區發展機制演變，及政府、媒體、企業力量的宣傳與商品化同等因素，相形重要。此說明了似乎還是必須有其他有利的歷史與社會條件配合之下，才有可能建立地方感。因此，僅憑「信任」、「合作」的社會資本，是無法完整解釋霧峰從洋菇菌種發展要地，轉而成爲今天金針菇生產重鎮之因。應當配合探討不同空間尺度，例如和鄰近地區的關係，甚至將農業產業置於國家經濟政策、世界市場取向化等面向，討論早期洋菇契約化小農，由農會配額生產及罐頭公司收購外銷的態勢，到現今金針菇專業化農企業的生產結構轉變，有助於理解置於全球化下台灣的農業棲位，其本身內部的調節與形塑力量爲何。

就國內外學者以社會資本探討地方或產業間的社會關係，可以瞭解經濟活動中，人的施爲和社會系統間交互作用是一種研究取向。從信任關係、網絡與組織合作、規範等社會資本的討論，能瞭解地方本身即擁有豐富的社會脈絡並創造了地方的張力，所以經濟活動是發生在複雜的社會脈絡裡，經濟過程即可視爲社會

文化的過程，而空間的動態性也呈現在其中。因此，本研究在探究霧峰地區洋菇到金針菇地方產業調適過程中，除了技術、資金、政策、市場外部環境等要素的解釋，建立在產銷關係中的地方意涵與社會資本的運作，如何在經濟活動轉型中成爲地方再發展的要件，並且產銷網絡中的行動者或組織機構所形成的動態場域，實爲具體呈現霧峰在地特有發展的社會空間，此乃本研究發展的重要意義。

問題發現與研究觀點在於，企圖讓產業與地方的扣連得以詮釋，因此以下將就「社會資本」觀點進行討論。理論，提供了檢視問題的角度，在已存在的分析指標與架構下，試圖定義操作概念與方法，讓已進入田調及論文深描有更外顯的實踐作用。

第三節 研究觀點與研究概念

一、研究觀點

（一）什麼是資本？

Albrow 指出資本(capital)這個概念最初是作爲出借支用的金錢(money put to use as a loan)（引自王中天，2003：145）。早期資本主要理解爲能生產產品的物質資本，並將其和土地、勞動並列爲基本的生產要素。而馬克斯(Karl Marx)指出「資本」不是物，是一種「生產關係」，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盧禹璁，2005：5-6），並視資本爲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所產生的剩餘價值，將資本作爲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勞動關係形成的解釋。

「資本」一詞到後來被擴大發展與爭議，出現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等新資本理論，因此資本也重新被闡釋。如林南(Nan Lin)將資本作一個廣泛的定義：對於一個有價值資源的投入和預期的回收，所謂「有價值的資源」，就是每一個社會所公認具有價值的事物；而回收可以歸納出三種，一種是經濟、財富的回收；另一種是政治的、權力的回收；第三種則是社會、地位的回收（林南，2007：7-8）。陳榮德（2004：65）也說明「資本」一詞，本身即代表「財富的累積(accumulated wealth)，並且可被用來創造更多的財富」，故其帶有投資與報酬的概念。

（二）資本的形式

P. Bourdieu 將場域中競爭的資本分爲：

1、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由生產的不同要素（如土地、工廠、勞動、貨幣等）、經濟財產、各種收入及各種經濟利益所組成；

2、文化資本：個人由知識、語言、行爲習慣、價值體系、生存心態(habitus)所組成的文化要素，特別在支持與維繫統治階級的文化與價值，是透過教育性(pedagogic)行動讓符號與意義得以內化到下一代，形成社會再製；

3、社會資本：社會行動者藉助占有持續性社會關係網而所掌握的社會資源及資本容量；

4、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用以表示禮儀活動、聲譽或威信資本的累積策略等象徵性現象。

社會空間中各場域之間就是多元化資本進行相互競爭與相互轉換的動態過

程。（Bourdieu,1985：243-252；高宣揚 2002：248-255；林南著，林祐聖、葉欣怡合譯 2005：20-27）

July(2003：13)認爲資本有下列幾種類型：

1、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生產自然性的商品與服務（如土地耕作、水的供應、植物授粉、土壤組成等）；

2、社會資本：產生對彼此有益的合作行動，有助於人們在他們自己社會中的黏合。社會資產包括了社會資本，如規範、價值及讓人們傾向於合作的態度、信任的關係、互惠與義務(obligations)、法規及彼此認可取得一致的意見，這些都連結及結構在網絡及團體中；

3、人力資本：是屬於個體的所有能力，建基在知識技能的累積，健康與營養上。藉由進入學校、醫療服務及成人訓練中而更增強能力；

4、物質資本(physical capital)：由人所製造的資源所累積的，包含建築、市場建設、灌溉設施、道路及橋樑、工具與牽引機，通訊，及運輸系統，這些都使得勞動者更具有生產力；

5、金融資本(financial capital)：是由商品及服務索取而來累積形成的，透過金融系統建立，聚集了資金及帳務，例如退休金、匯寄、福利支付、獎助金及津貼補助。

以上學者對於資本的定義與分類中，可瞭解資本是生產的結果，也是生產的因素，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資本運作與累積，都具有預期利益的投資資源。而本文研究中以過去霧峰多數農家，均在政府鼓勵的洋菇產銷計畫下投入生產，日後卻僅有少數菇農願意且可以投入龐大資金，以轉型專業化金針菇栽培，其中的因素包含技術研發、產銷關係、市場需求等，這些都隱含了過去洋菇種植經驗及人脈資本累積，讓金針菇菇農在既有基礎上，持續投資且拓展新的合作與社會關係，以能在農業生產上隨時嗅出新的市場脈動，創造報酬利潤。因此本研究採用「社會資本」觀點，接下來將就其概念發展與內容作進一步的探討。

（三）社會資本的定義

近幾十年來關於「社會資本」議題的探討已有快速的成長。它的價值在十九世紀時爲 F. Tönnies (1887)和 P. Kropotkin (1902)所定義，隨後 J. Jacobs (1961) and P. Bourdieu(1986)形塑其概念，而 J. Coleman(1988，1990)之後給予一個新的

理論架構，R. Putnam(1993，2000)則讓它引起了廣泛的注意，Coleman 形容它爲「在行動者及行動者之間的結構關係」，而這能鼓勵生產力的活動，這些社會的結構及組織的觀點，對於個人來說是作爲資源以舖設個別利益(Bromley 1993：1-8)。換句話說，可以視爲行動者（節點：node）與行動者間透過資源(resources)的取得與交換而形成連帶(ties)，而眾多節點之間的連帶就會構成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社會資本便是源自於此關係網絡（圖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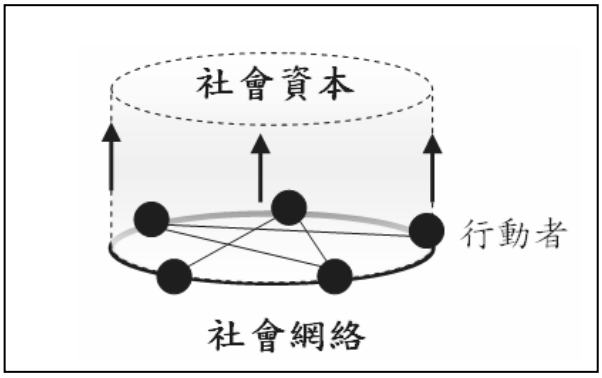

圖 1-3-1 社會資本源於社會網絡關係示意圖

P. Bourdieu：「社會資本是真實或潛在資源的總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係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係或多或少是被制度化的」(Bourdieu，1985：248-249)。在這種形式下，社會資本就端視個人連結網絡的資本容量及規模大小而定。

Coleman 致力於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觀點來發展社會學理論，也導引經濟學家對於理性行動的原則來分析社會系統，加入社會脈絡說明。他認爲社會資本爲個人所擁有表現爲社會結構的資源；社會資本依據它的功能來定義，能促進某些行動者的行動；如同其他資本形式，社會資本是具生產力，是無形的，存在於行動者與行動者之間的結構關係中(Coleman，1988：98-101)。此外，Coleman 將社會資本分爲四種形式：1、義務與期望(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立基於信任的重要，及行動者彼此之間的義務與期望關係上；2、潛在資訊(information potential)：提供行動者存在於社會關係內部的資訊流動；3、規範及有效懲罰(norms and effectives actions)：規範與懲罰制約行動者的行爲，克服集體中有坐享其成的問題；4、權威關係(authority relations)：藉由行動者之間控制權的轉讓，集中於某人身上的權威，可以增加社會總資本(total social capital)(Coleman，1990)。

Putnam 以政治學視角比較義大利南北政府績效差異性的研究中，指出社會資本的深度如何影響國家與區域經濟發展。他將社會資本界定爲社會組織的一種特徵，例如：信任、規範與網絡，這些社會組織特徵，能促進合作的行動來改善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是群體所共有的資本，在長時期合作蘊釀中產生。(Putnam，1993)

Solow 定義「社會資本」，例如信任、意願、合作與協調能力，和即使沒有人監督仍然致力於共同努力的習慣(habit)—所有這些及其他行爲模式，依據聚集的生產力獲得一種報償(Solow，2000：6-10)。

Jules(2003)認爲社會資本是分析，永續鄉村發展及自然資源管理的重要因素，可被定義爲四個特點：1、信任關係(relations of trust)；2、互惠及價值交換(reciprocity and exchange)；3、法規、規範和處罰(common rules、norms and sanctions)；4、連結網絡和團體(connectedness、networks and group)。

Adler 和 Kwon 以爲，社會資本如同其他資本形式一樣，也是一種資源，非行動者所專有，而是存在於行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中，而關係有三種型式：1、市場關係(market relations)：生產與服務作爲金錢交易或等值的交換；2、階層關係(hierarchical relations)：服從於權威(authority)以作爲物質及精神上的保障，爲一種支配與控制的不對稱關係；3、社會關係：由互惠、信任所形成，亦是社會結構下的社會資本。它的效力對行動者來說包含了資訊、影響力的流動，及可利用的團結力，而這之中隱含了內部及外部的連結，使得社會資本對於個體或合作者之間而言都有助益。(Adler and Kwon，2002：17-23)

社會學家林南(Nan Lin)主張社會資本和其他資本不同之處在於，資本是嵌於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資源之中；同時很重要的一點是，社會關係和社會資本並非是對等的，因爲社會資本涉及到「資源」的問題，也造成別於社會關係與網絡的討論，社會資本更有一個「力量」的概念。所以社會資本是一個重要的中介機制，它的產生暗指一個人的結構地位，也就是站在什麼樣的位置，可以接觸到什麼樣的社會資源（林南，2007：8-14）。

社會資本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結構共同體」的代名詞，它不僅表現爲個人、組織間相互聯繫的廣度，且體現爲這些連繫的穩定度和擴展度。社會資本不僅爲個人實體所擁有，也爲廣義的組織實體所擁有；既表現爲有形的關係結構，更表現爲無形的資源要素（閻海峰、魯直，2003：39）。

在社會資本方面的研究多有力地強調了它的積極面向，然而 Portes(1998)談到社會資本的負面爲：排他性、對團體成員要求過多；限制個人自由及用規範來消除創新等。

綜論上述學者的看法，社會資本廣爲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領域間探討，除了成爲跨學科共同語言的價值外，發展概念呈現出百花齊放的論述，但基本上皆認同社會資本是基於社會關係所衍生的支持性能量。其中源於社會資本討論最大的爭議在於：它是個人所擁有的資源，亦或是社會結構中由關係所形構而成的社會資產，也有學者綜合兩者，認爲社會資本是鑲嵌著資源的制度化社會關係，也被認爲有益於集體以及集體中的個人。茲綜合學者定義將其概念分爲三大層次（表 1-3-1）：

表 1-3-1 社會資本的定義整理

層次	討論面向	學者	社會資本的定義
微觀	以個人爲出發點，視其所處的網絡範圍，及可從中取得的資源容量。	Bourdieu	一種真實或潛在的資源總和，而這種資源是源自於擁有一種長期穩定的網絡關係（1986：248-249）。
		Baker	爲一種行動者可自特定社會結構中取得且利用以追求利益的資源；產生於成員間關係的變化中（1990：619）。
		Portes	藉由社會網絡或社會結構中成員而獲取利益的能力（2000：48）。
		Lin	個人對社會關係的投資。藉此它可獲得蘊含在這關係中的資源以增加其工具性(instrumental)或情感性(expressive)行爲的回收（1999：417）。
宏觀	以集體概念爲中心，社會資本爲共享資源，信任、規範及合作的關係可促進成員間共同解決群體問題。	Coleman	社會資本有兩項特徵：首先它們都包含社會結構的某些面向；其次它們都能協助達成該社會結構中的某些行動‧‧‧‧‧‧，社會資本是內生於行動者關係結構之中（1988：98）。
		Putnam	社會組織的特徵如網絡、規範、及社會信任，皆能爲了彼此利益而促進合作與協商（1995：67）。
		OECD	能順暢團體內合作或團體間合作之網絡、共享的規範、價值觀與瞭解（2001）。
		Fukuyama	一組由成員所共同認可的非正式價值或規範，它可促使成員合作（1999：16）。

綜觀	社會資本應該是結構和行動相互配合，透過結構觀點探討網絡的結構化及其成員之間的連繫情形。	Woolcock	一個社區內個人及制度關係的本質與外延（1998：182）。是個人社會網絡的資訊、信任及互惠的規範（1998：153）。
		Burt	強調個人因智慧、教育與年資所得的回收是部分決定於他在市場或科層組織(hierarchy)的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location)（1977：339）。
		Nahapiet &Ghoshal	鑲嵌個體或社會單位所形成社會網絡中，所有真實及潛在資源內的總和；社會資本同時包含網絡及網絡中流動的資產（1988：243）。
		Adler& Kwon	社會資本對個人或群體皆存在益處，其源自於行動者間社會關係的結構與內容，給予行動者資訊、影響力及團結一致（2002：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dler 和 Kwon（2002：20)、王中天（2003：155-156)、洪啟嘉（2004：2-6~2-8)。

社會資本探討存在於網絡、信任、規範之間所產生的概念儼然呈顯。不同於 Putnam 政治學家的視角，將空間視爲是靜止(static)、已存在的(pre-existing)、及已知的(given)的狀態(Holt，2008：230)，社會學家 P. Bourdieu 以「場域」概念來解釋某一社會空間中，由特定行動者相關係網絡所表現的各種社會力量和因素的綜合體（高宣揚，2002：233）。場域有特殊的時空脈絡，在社會生活的相互關係網絡中，主要是靠行動者不同社會地位，依其所握有的資本總量和權力範圍，及行動者所賦有的生存心態(habitus)，在較量中所進行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實踐緊密相聯繫（高宣揚，2002：228-232）。而地理學在此基礎上，亦納入社會資本的價值加以論述地方中細緻的社會關係內涵。Schaefer-McDaniel(2004)考慮了實體空間或地方對於社會資本存在解釋的重要性，提出「歸屬感與地方附著」(sense of belonging and place attachment)來概念化社會資本與空間/地方(Holt，2008：235)。因此地理學可以處理社會資本如何透過個體在特定地方的相遇而體現，而地方在寬廣的社會關係中是具體的、可無限延展且瞬間動態的過程(Holt，2008：235)。

透過上述討論，本研究將以社會資本綜觀層次作爲討論，原因在於：

1、集體面向：在洋菇及金針菇產銷網絡中，鑲嵌在成員間的網絡合作、規範形成及社會信任等動態過程，是如何影響個人行爲及經濟成長，並呈現兩種不同時空背景下社會空間的異同；

2、個人面向：從洋菇到金針菇產業發展中，僅有少數大農得以轉型繼續投資生產，爲個人層面中社會資本累積的差異性；再者，現今金針菇 5 戶農家其生產規模與產銷網絡關係皆不同，社會資本的掌握與利用呈現不均等的狀態，故從微觀尺度上的分析有其必要性。最後，這些社會資本的積累與運作無法脫離霧峰在地網絡所形構的特殊社會空間，因其不同歷史時代和社會條件下，都有它自己特殊的運作邏輯。因此必須根著於地方社會空間中，才能分析深深隱藏於其中的社會實踐與關係運作。

因此本研究以社會資本綜觀面向的地理視角分析，將社會資本定義爲「**鑲嵌於個體或社會單位所形成之特定地方的社會網絡中，透過信任、規範、網絡合作、資訊交流等關係資產轉爲經濟性資本，直接作用在日常生活脈動中，所形塑而成的社會空間同時是網絡行動者的中介與結果。**」。

二、研究概念

（一）產銷結構與地方調適

本文首先將從霧峰洋菇到金針菇的地方調適過程作探討。在國家農業政策、市場機制等社會經濟脈絡結構背景下，從洋菇到金針菇商品的改變，意味地方產業變遷過程的調整及產銷網絡所體現出產銷空間的差異。因此，由菇類產業中行動者，如菇農、菌種場、政府研發單位、上游原料供應商、批發商等所形成的產銷網絡爲出發，將以洋菇到金針菇生產與銷售過程分爲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農業投入（培養原料、栽培設施、技術、資訊）、生產過程（菌種培育、接菌培養、栽培管理、採收、包裝、廢包處理）及產品銷售（集貨、散貨、食品工廠收購、批發），以作爲論述基礎。

由產銷過程求得金流、物流、勞力流、資訊流等互動型態，爲產銷網絡的體現。最後，比較洋菇和金針菇在不同時空產銷過程所呈現出關係網絡的差異性，具體落實在地方產銷空間的不同，並試圖理解轉型過程中地方如何因應內在、外在環境改變所作的調適。

（二）社會資本操作性指標

接著企圖透過社會資本的概念以瞭解霧峰洋菇到金針菇農作轉型與地方調適中，社會資本的運作如何呈現出小農到大農經濟型態的差異性，並浮現出內部發展不均的農業地景。綜合社會資本內涵的討論採用其中的三種社會資本形式作

爲分析指標：網絡合作、信任關係、規範關係；嵌入金流、物流、勞力流、資訊流四個具體互動型態爲分析面向，析論產銷網絡中社會資本的運作如何影響菇農經營產業的發展。

社會資本分析指標操作型定義如下：

1、網絡合作：

「網絡」可視爲一群界定清楚的成員（包括個人、團體），透過社會關係相互連結所形成的組織。網絡主要具備有四種功能：（1）網絡可以藉由快速轉換相關資訊或知識，促進行動者相互學習；（2）網絡中的行動者可以藉由密切關係取得正當性與地位；（3）穩定的網絡關係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並且建立彼此的信任；（4）網絡有助於適應非預期的環境變遷(Podolny and Page，1998：62-66)，而網絡當中的合作可以透過互動動機、頻率、資訊交換及運作模式瞭解。社會資本的累積是處於動態社會關係的強化過程，愈多強連結存在時，將能影響共同決策和集體行動(Jules，2003：9)。而當檢視由國家主導的洋菇產業，與私人企業體制下的金針菇經營，顯示出不同網絡有不同的連結方式與合作功能運作。

2、信任關係：

信任，需要在反覆互動且長久時間發酵下建立。在功能性的解釋上，信任是合作關係的潤滑劑(lubricant)，減少人與人之間的制度控制與監督成本(Jules，2003：9)；信任也是一種工具(instrument)、一種投入(input)，爲網絡組成的結構要素，藉由特定空間的聚集與關係空間的互動中，在默識知識(tacit-knowledge)、創新、學習上的分享與機會交換(Murphy，2006：427-433)。以物流面向裡菌種的交易買賣爲例，從過去洋菇菇農與菌種場之間的信任是依據菌種品質的好壞，到金針菇時期完全是菇農獨立研發菌種，可窺探之轉型過程中信任關係的微妙差異。

3、規範關係：

規範，偏向指示個體應該如何行動。藉由彼此認同的法規或規範，來控制個人行爲以維持團體利益，這反映出團體的影響力置於個人之上，個人也同意調節或控制他們行爲的程度；同時一個高度擁有社會資本的團體，意味個體能平衡個人權利和合作義務(Jules，2003：10)。而正式規範是爲權威者所設立，例如法律及義務；非正式規範是個體間用來形塑他們每天的行爲。資訊流面向上如部分金針菇生產者未能遵守制度價格行規時，私底下以賤賣的方式來破壞行情，在網絡

中有無制約性與規範力量。這個變動實體的聯繫強度，將藉由將行動者視爲積極運用其在網路所處的位置，及彼此間衝突、協調、溝通等型式來解釋如何獲取滿足私人利益的資源行動。

結合三項操作指標在具體分析面向上爲：

（1）金流：金融貸款、帳目結算日數、契約簽定細目；

（2）物流：原料來源、菌種與產品品質、產期調節與產量收購；

（3）勞力流：雇工來源、勞資關係；

（4）資訊流：投資效益、技術交流、知識傳播、價格訂定、市場供需。

表 1-3-2 研究分析內容細目表

生產要素—農業投入—生產過程—產品銷售

互動面向 社會資本指標	金流	物流	勞力流	資訊流
網絡合作	• 金融貸款	• 原料來源 • 產期調節與產量收購	• 雇工來源	• 技術交流 • 價格訂定 • 資訊傳播
信任關係	• 金融貸款 • 帳目結算日數	• 原料來源 • 菌種與產品品質 • 產期調節與產量收購	• 雇工來源 • 勞資關係	• 投資效益 • 技術交流 • 知識傳播 • 價格訂定 • 市場供需
規範關係	• 金融貸款 • 帳目結算日數 • 契約簽定細目	• 產期調節與產量收購	• 勞資關係	• 價格訂定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架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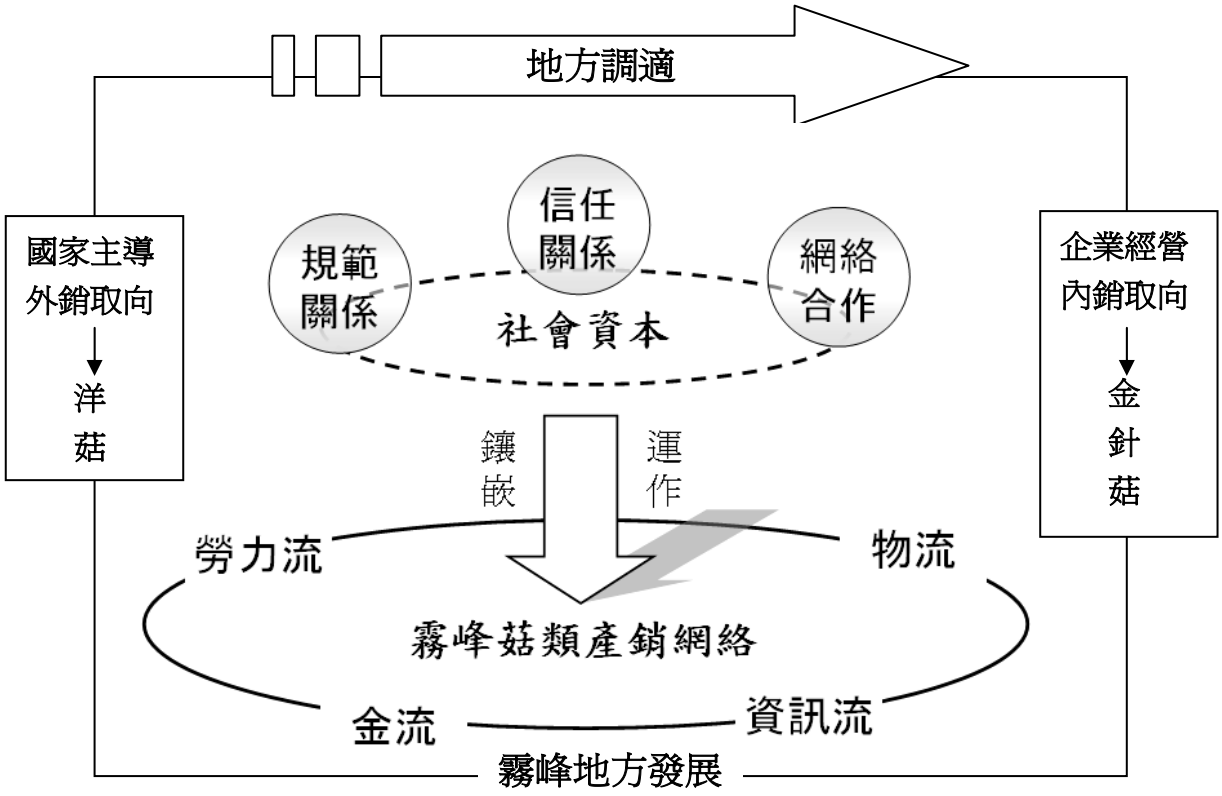

圖 1-4-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方法

爲達本文之研究目的，以上述研究概念爲基礎，進而蒐集相關資料以釐清並解決問題。

具體研究方法如下：

（一）相關資料的蒐集

1、統計資料，如：

（1）農林廳、農委會、罐頭食品工業公會等出版的統計資料；

（2）台中縣政府、霧峰鄉公所的統計要覽。

2、相關研究，如：

（1）台灣農業經濟發展研究；

（2）霧峰地方發展相關研究；

（3）菇類栽培與菇類產業發展研究。

3、報章資料，如：

報章資料以《聯合報》、《經濟日報》爲主。

期望透過文獻資料的閱讀與分析，幫助了解研究區域由洋菇至金針菇的發展歷程及各時期的社會經濟脈絡與產銷制度。

（二）田野調查

爲外翻出社會關係中的社會資本如何活絡網絡的動態性，將採取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所謂質性研究，陳向明（2002：15）將其定義爲「質的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作爲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搜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爲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質的研究者相信，資料只有座落在其社會及歷史網絡中才有意義，也才能被瞭解（劉仲冬，2006：132）。因此藉由質性研究能瞭解研究對象：菇農，在產銷網絡中的生活經驗，進一層次理解其在社會情境脈絡中的行動與實踐層面的表達。

野外實察則採用質性方法中之一的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爲主。深度訪談是通過語言交流，可以達到一定的相互「理解」，並接近主體之間視域的融合，建構出對研究者有意義的社會現實（陳向明，2002：227-228），方式將從研究初期使用開放型訪談形式，後期伴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步轉向半開放型訪談。

訪談對象包含農會人員、菌種場經營者、農民（包含生產金針菇的五家農戶、霧峰五個菇類產銷班農民，以及曾種植過洋菇而未再栽植的農民，後兩類受訪者是熟人引介並採用滾雪球式的訪談）、銷售通路如菇販。

調查內容分爲產銷過程及社會資本運作兩類，如以下細目所述：

1、產銷過程調查

（1）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

（2）農業投入：培養肥料、木屑、栽培設施、栽培管理、技術、資訊；

（3）生產過程：菌種培育、接菌培養、採收、包裝、廢包處理；

（4）產品銷售：集貨、散貨、食品工廠收購、批發。

2、社會資本調查

以網絡合作、信任關係、規範關係等指標具向分析產銷過程中細緻的人際互動行爲：

（1）金流：金融貸款、帳目結算日數、契約簽定細目；

（2）物流：原料來源、菌種與產品品質、產期調節與產量收購；

（3）勞力流：雇工來源、勞資關係；

（4）資訊流：投資效益、技術交流、知識資訊傳播、價格訂定、市場需求。

（三）空間呈現

Holt(2008：238)指出要明確體現社會資本的運作，需視個體的生活範圍及其社會網絡如何在社會空間內涵中形塑。因此將調查對象在生產與銷售網絡中人際互動的地點，具體標誌於地圖上以繪製成社會空間圖，將可展現產銷互動過程與社會資本如何座落於霧峰特殊的時-空脈絡中，以建構霧峰一個「菇的故鄉」的地方意象。